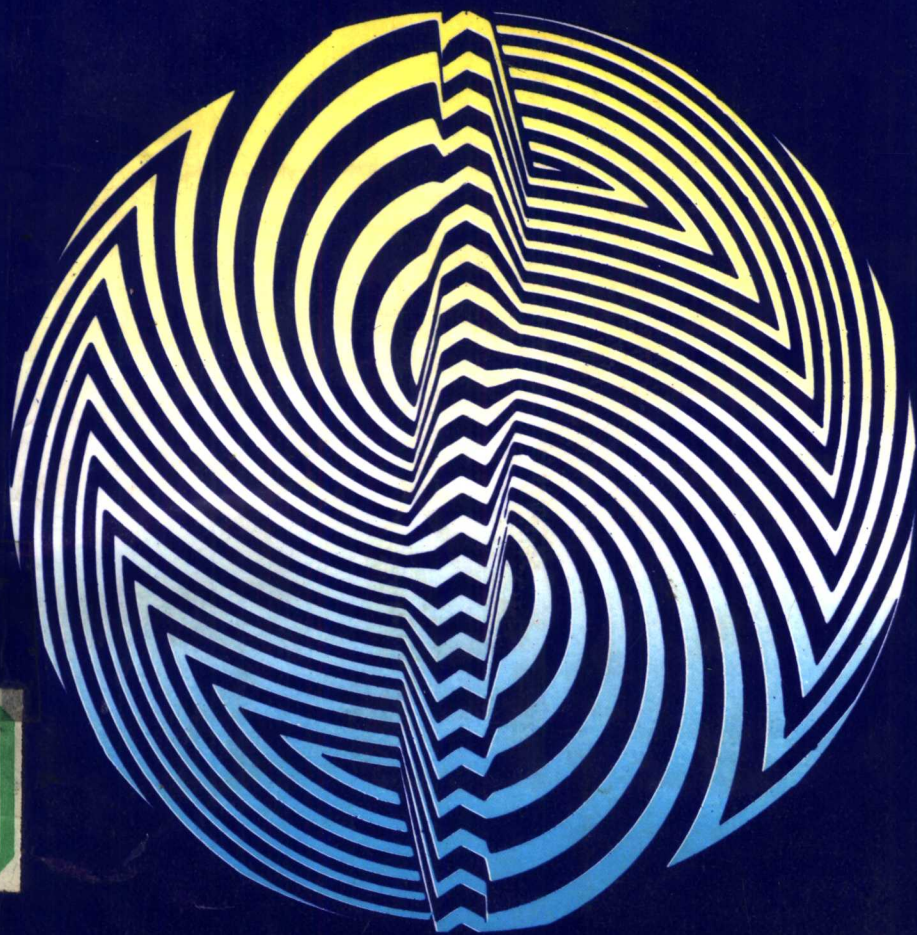


传播媒介与 美国人的思想

——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

——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 著

曹静生 黄艾禾 译

左 宇 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by Daniel J. Czitrom

Copyright © 1982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

——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

(美)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

曹静生 黄艾禾 译

左宇 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大32开 7印张 173(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册 定价: 4.50元(平) 6.50元(精)

ISBN 7-5043-0725-4/G·245

前 言

大部分历史著作都包含着自传的成分。我自己对现代传播媒介历史的迷恋可以追寻到我个人的经历中，特别是在我在纽约市的成长时期，那时候现代传播媒介大规模普及，无处不在。我纳闷，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瞩目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广义上说，我最初关注的事情，是探索传播媒介如何改变了上一个半世纪美国的环境。新的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闲暇和消费的实质、社会化的进程，以及思想风气？它们实际上为何对美国日常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无所不在，加上它们总是注重新事物，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设置了或许是最难以克服的障碍。除了其它的冲动，本书是想用某种方法弄清今天的传播媒介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想再现这些媒介所微妙地否定了的过去，想还原它们的公开面目，想把我们用以测量和解释过去事物的文化含义的那种方法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本书就是这些思想冲动的最终成果。

我所关注的范围的广度，以及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令人吃惊的缺乏，促使我尝试对美国现代传播的理性历史的研究。然而现代传播的理性历史必定牢牢扎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我对理性历史倾向于最宽泛的定义，即不仅把这一领域理解为正规的思想史，它最终还是符号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关系的历史。本书书名中的“美国人的思想”（American mind）这个词并不

意味着某种涵盖一切的、神秘的统一体。也许有点讽刺，我用这一词语只是想说明我想尝试尽可能对新式传播手段的历史思想和情感作广泛的思考。

我是以这种思路来阐述我的中心问题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对于理解现代传播影响的努力是如何演化的？这些努力曾经又是如何与美国社会思想的更大领域相契合的？这些思想与不断变化的传播技术和制度曾经是什么关系？在新传播媒介形式的发展中早期的公众反应又起了什么作用？

我将我的探索分为两部分，以便得到对这些问题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观察。第一部分分析了对于三种新传播媒介的当时的反应，包括公众的反响。这部分的每一章中，我探索了这些意见以及它们与传播媒介本身的技术与体制的发展的密切关系。我是从电报入手的，因为电报标志着传播第一次从传递中分离出来，并开创了电子媒介的时代。电影则预告了大众文化令人震惊的新形式的诞生，并对人们已经接受的文化观念本身提出挑战。对无线电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考察广播这种最强有力、最普及的现代传播形式的兴起。

在第二部分中，我从整体上探讨了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影响有关的三种主要传统，或是信仰。进步党“三人组”的查尔斯·霍顿·库利、约翰·杜威和罗伯特·帕克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整体本质进行了开拓性探究。经验主义研究的行为探讨方法，即“效果”研究成为数十年来美国传播研究的流行模式。最后，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激进的传播媒介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心力量的传播技术的变革。

在探讨中我认识到，文化和传播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重合。现代传播已成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观念和现实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大众文化”这个词今天的含义从电影兴起时就有了。贯穿第二部分的一个重要的潜在主题是20世纪中文化与传

播观念间的清晰界限的不断消除。我想，本书中这些范畴的相互作用反映出思考这些问题的思想家（常常是无意识地）对这些范畴的糅合。

在后记中，我将对“传播媒介”这个词的真正困惑作更充分的考察。历史的研究和论著也许不会如我想象的那样成功地澄清这些思想困惑。比较有希望的是，它至少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是（并且已经常常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事物。例如，我们可以确切地把“电视”说成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审美的形式；是广告的主要承办者和“生活方式”的主宰者；是当代政策的参数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欺骗性的复杂的符号系统；或是高度个人化的、民主地分布于许多人每日生活中心的形式性的生活项目。我们在尝试对传播媒介的现实和未来形式作出有意义的论述时，应当谨记传播媒介历史的全部内容，包括公众对它的反应。

我的遗憾在于我仅仅是触及了我要讨论的事情，尽管我承认已经触及了很大的范围。过去若干年中大量新的研究，特别是对电影和广播的研究繁荣兴旺，减轻了开始探讨这个题目时的古怪的理性上的孤独感。我们关于传播媒介历史的知识充其量只是保持着粗略的状态，留着大量需要填补的空白。新的传播媒介如何重造我们对过去的概念，又如何勾画出知识本身的轮廓，这些起历史和的认识论的问题几乎一点也没被讨论过。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我认为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产生成果的一些可能性。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促进对现代传播媒介的新的历时性分析，也许有助于平衡过去20年间传播研究中大量增长的共时性研究。

为使这本书得以完成，许多不同类型圈子中的朋友和同事给了我重要支持，特别是他们运用了一种思索的对话形式。这些思索既严肃又幽默，它们源于共同的关注：去理解媒介是如何直接于预着我们的理性和感性的生活、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工作、我

们的审美态度以及我们的集体记忆。我们微薄的努力就在于提高这种理解的历史性。我参与了《文化通信》杂志的工作，担任编辑和撰稿人，目标就在于重新发现并开拓已失落或被人忘却的大众文化的重要方面，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引起政治变革的方面。围绕着《文化通信》的共同工作，使我从保罗·比勒、乔治·利普兹和戴夫·瓦格纳的见识中和富有同情的支持中获益不浅。我同样对不断给予我鼓励的戴维·马克、迈克尔·斯塔尔、吉姆·霍伯曼、鲍勃·施奈德、玛格丽特·哈勒、齐夫·奎特尼、理查德·基尔伯和吉姆·默里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应当对进一步提高本书质量的工作态度认真的编辑帕梅拉·莫里森表示我的谢意。

1974年，我在麦迪逊第一次听到詹姆斯·W·凯里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后来的交谈和通信中，詹姆斯给予了我在杂乱的写作初期界定题目时所迫切需要的建议和鼓励。他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目录线索和他自己一些未出版的著作。他的一些已出版的论文同样是给我理性启迪的关键源泉。

拉塞尔·梅里特阅读并评论了每一章早期的手稿。他非常慷慨地与我共享他对早年只收“五分门票”的影院的研究成果。他认真的批评和文献目录对我的帮助极大。

保罗·K·康基也阅读并评论了所有章节的早期手稿。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曾参加了两年他的思想史研究班，我的研究就是在那里成型的。他的仔细的批评性阅读有力地加强了我的思考和写作的分量。

在知识上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我的朋友丹尼尔·T·罗杰斯。在过去几年里，丹尼尔敏锐的批评和始终不渝的信心为这本书的概念形成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仔细阅读了每一章的手稿并向我提出了大量建设性的评论。然而，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激励我坚持耐心地找到我自己的见解。

最后，我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它是美国少见的真正民主

的高等学术机构之一。我相信，它将继续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者，不计较他们是著名的教授还是出租汽车司机。

丹尼尔·J·切特罗姆

纽约市

1981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同时代人对三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反应	(1)
第一章 “闪电式传播线路”与现代通讯的诞生 (1838—1900)	(1)
第二章 美国电影和新的 大众文化(1893—1918)	(31)
第三章 太空家庭：从无线电 电报到广播的美国无线 电技术(1892—1940)	(65)
第二部分	
现代传播媒介的理论家	(98)
第四章 走向一个新的社会？查 尔斯·霍顿·库利、约翰·杜威 和罗伯特·E·帕克的社会学说 中对现代传播的论述	(98)
第五章 经验主义的传播媒介研 究的兴起，作为行为科学的传播 研究(1930—1960)	(131)
第六章 超历史学、神话学与传 播媒介：哈罗德·英尼斯和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美国思想	(158)
后 记 美国传播媒介中的辩证张 力，过去与未来	(198)

第一部分 同时代人对三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反应

第一章

“闪电式传播线路”与现代通讯的诞生

(1838~1900)

1844年，第一条电报线路在美国的诞生，开创了现代通讯的新纪元。在此之前，邮递和通讯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信息传播的快慢只能取决于信使的传递速度。电报改变了二位一体的状况，并且迅速地在国土上蔓延开来，形成第一个规模巨大的通讯网络。早期电报的见证人无法预见到现代通讯工具难以理解的奇迹，而这些工具中有很多是“闪电式传播线路”制度上和技术上的产物。瞬间通讯这一令人敬畏的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认真思索；未来的可能性看起来似乎不会再象眼前的现实那样令人瞠目结舌。

电报被许多人称为“这个最引人注目的时代的最引人注目的发明”。在思索它的深刻意义的过程中，美国于19世纪中叶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化的重大争论，这场争论不断加剧并持续到今天。知识阶层和普通公众对电报的反应包含着了解现代通讯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的最初尝试。到了今天，对新的通讯形式的设想为认

识一些相当古老的命题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些旧命题由于科技的发展，有了一种新的涵义和解答它的紧迫意味。电报，这个“时空超越者”，将会为思想、政治、商业、报刊，以及精神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什么呢？

对这些问题认识同电报系统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公司等集团势力、垄断、政府法规等等——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而且常常相互纠结在一起。在取得对近代通讯的第一次突破后，电报制度的历史只能作为探索文化认同的必要基础。但是，通信革命的真实涵义和电报的现实用途之间，热烈的幻想与平淡无奇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纠纷，它构成了上述历史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1858年，在纽约为大西洋海底电缆竣工而举行的规模浩大的庆祝活动中，美国科学家约瑟夫·亨利在其演说中将电报誉为美国创造力的最大体现。他宣称：“19世纪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将抽象理论应用于实用技术以及物质世界的内在力量为智慧所控制，成为文明人的驯服工具。”亨利的说法精确地体现了现代人对“科技”一词的理解。并非只有他一人认识到，电报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科技进步，是应用科学将要结出的果实的最显而易见的证明。

化学、磁力学和电学方面基本原理的发现，使一种实用的电磁电报（与信号电报相对）得以形成。19世纪对电报历史的描述都是从泰勒斯（朱利都人）和其他古代人发现电开始写起的。18世纪，英格兰的沃森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率先用金属线输送电流。到了90年代，意大利的伽伐尼和伏特揭示了直流电的原理，即通过金属在化学上的酸性反应获取电流。大约在1820年，丹麦的奥斯特和法国的安培发现了电磁场。到1831年，普林斯特大学的约瑟夫·亨利用一小组电池代替一个大电池，解决了如何产生一个强磁场，使其能在一定距离内具有力学效应的关键问题。19世纪

20~30年代，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法国的安培、俄国的希利力，德国的施泰赫尔、英国的戴维、库克和惠特·斯通等，共同发明了一种实用电报。

塞缪尔·莫尔斯，艺术家兼银版照相师，人称美国的列奥那多·达·芬奇，在1838年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磁电报机。莫尔斯一生的事业可以说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是如何受到19世纪科技推动者的交口称赞。年轻时，莫尔斯在欧洲学习绘画和雕塑。在美国，他的人物肖像画和风景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832年他成为纽约大学的绘画和设计教授，以后又当选为全美设计学会的第一任会长。莫尔斯还显示了他在科学上和物理试验方面的极大兴趣，他尤其专注于电学研究。1832年，他设想了一个通过金属线运用连续的电脉冲传递信号的计划。他最初的动力来源于希望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得一笔收入，以便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绘画之中。

但是此后的12年，由于个人的贫穷和公众的冷漠，莫尔斯逐渐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电报上。他对前人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他的成就包括提出电报的概念，即电报早期的机械形式，并发明了通信电码。1837年以后，他的同事列奥那多·盖尔、约瑟夫·亨利、阿尔弗雷德·威尔和埃兹拉·康奈尔从学术上、机械上和财政上给了他重要的帮助。莫尔斯的发送设备是简陋的键式发报机；接收机则主要由电磁铁组成，这个电磁铁紧紧地吸附在一组衔铁上，衔铁上绑着一支钢笔或铁笔。一个时钟式的电动机带动位于钢笔或铁笔下的记录纸带，铁笔便在纸带上显示出同电流脉冲一致的图形。阿·威尔后来又设计出一种简化接收的装置，让报务员根据收听到的电信号读出信息内容。

1838年初，在他的设计经过一系列公开论证之后，莫尔斯向国会提出了建立一条实验电报线路的拨款申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镇上的威尔家族钢铁厂，在费城的弗兰克林学院，在华盛顿的

国会商务委员会，电报的展览到处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据莫尔斯自己说，1838年1月13日在莫里斯镇的展览会上，他通过两英里长的线路发送去一封长信：“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一事件，纽华克的主要居民星期五特地前往观看。”范布伦总统和他的全体阁僚也要求观看，1838年2月21日，莫尔斯为他们专门表演了一次。但要消除对莫尔斯努力结果所持的怀疑和嘲笑也决非易事。在他获得3万美元为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条线路之前，他度过了孤独和屡遭挫折的5年时光。即使在后来，那笔拨款也是在国会对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修正案作了一次类似玩笑的讨论后才通过的。这一修正案认为，这笔款项中的一半将用于令人迷惑的试验。莫尔斯最终于1844年5月21日开通了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他在第一份电报的电文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

莫尔斯和他的合伙人希望把他们的发明卖给联邦政府，但国会尽管对第一条线路予以补助，却拒绝购买专利权。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非法投机和建设的时期。莫尔斯及其合伙人和那些按专利权而租得建筑权的人都被卷入了极其复杂的法律纠纷中。尽管如此，8年后美国已能够夸口说它拥有长达两万三千英里的电报线了。在此期间，许多惊奇不已的美国人都在思索着对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信息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公众带着自豪、激动和惊奇的复杂心情迎接第一次“闪电式传播”。同时又有些疑虑、怀疑和由迷信引起的恐惧。看到电报的人常常带有一种复杂的心理。当电报的铺设开始向四处蔓延时，一些城镇中怀疑的、相信的或者仅仅是好奇的市民蜂涌而至，以便亲眼看看这个新玩艺儿。

5月初，实验线路准备就绪，莫尔斯从华盛顿报告说：“人们对电报出现了狂热，我的房间都为之拥塞。”为克服普遍存在的怀疑，他懂得公开展览的必要。“刺激好奇心是一个好方法。”他对在

巴尔的摩那头的阿·威尔说：“你可以请过路人给你一些短句然后拍发给我，让他们注意发出的时间并到国会大楼核实我收到的时间。”在5月24日发出电报以后不久，电报对正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生了重大影响。莫尔斯和威尔关于詹姆斯·波尔克被提名的消息，在华盛顿引起了轰动。塞特斯·赖特通过电报拒绝了副总统的提名。尚未闭幕的大会派遣了一个委员会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同赖特会晤以核实这一消息。次日一个委员会试图通过电报改变赖特的决定，但未获成功。

报界的报道和政府官员的目击记录，有助于使莫尔斯的突破能为人们合理接受。这个兴奋的发明家在5月31日描绘当时的情景时说：“聚集在国会大厦电报房窗前的人群听到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消息时，兴奋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此后他们似乎便对电报大为倾倒。”阿·威尔从巴尔的摩报告说，那儿的人每天都包围办公室，要求看一眼电报机。他们保证“不管懂还是不懂，他们将一言不发，也不碰任何东西，他们仅仅希望能够说自己看见过它。”

怀疑激起了人们亲眼观察电报机的愿望。1846年5月，罗切斯特的一家报纸在焦急地等待电报铺设到该城的盼望中说：“相隔数百英里的人们能够即时通话，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只有在亲眼看到它之后才能认识到。”报纸把电报忽而称为“奇妙的发明”、“近乎神奇的媒介”，忽而又叫做“异乎寻常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当1846年初大批人在费城参观第一个电报站时，一家当地报纸总结道，“因为电报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东西，起初我们很难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人们只有在接触和看到它以后才能真正理解这场由于时间被超越而引起的革命。”

在这之后，西部和南部也是热情不减。电报商和电报股份推销员的足迹远至边疆，在公共礼堂内向观众作展览。电报房为观众留下了足够的地方，通常还允许他们拍发姓名，只收少量费用。辛辛那提一家日报在欢呼电报的到达时说：“我们可以和东部

所有的大城市进行瞬间通讯，这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1847年夏，“闪电”到达俄亥俄的热内斯维尔时，报纸描述了当地的反映：“电报线和其它设备在我们的城市激起了强烈反响，大部分人懂得它的作用，还有一些曾经对它能传递消息嗤之以鼻的人，现在也用理解的眼光去看待它了。”

对电报的怀疑和不安不光在热内斯维尔存在。埃兹拉·科内尔，莫尔斯的助手，曾经管理过第一条电报线的建设，遭遇了伴随着公众的欢呼而来的啾心的焦虑。1844年秋，科内尔前往纽约建设电报示范线，他发现市政当局担心电报会对公众产生某种难以确定的危险。他们迫使科内尔付出一笔费用，用来请著名教授本杰明·西里曼确认电报不会对公众安全产生任何威胁。

作家威廉·本特·威尔逊在1902年追忆起他为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宾夕法尼亚电报线当通讯员的岁月时写道：“很少有人相信那些与电报有关的人的好奇和轻信的特征，知道电报原理的人是多么少啊！”电报线在风雨中摇曳。

严冬的疾风吹出某种悦耳的、神秘的、幻觉般的声音，人们远远地就能听到它，这使乡间村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公众的头脑里充满了迷信，许多居住在电报线附近的人在听到劲风吹过电线发出的声响时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不怕劳累，远远绕过久已走惯的道路，为的是避免靠近电线或从它下面穿过，尤其在太阳落山以后更是如此。

威尔逊同代人中一些较开放的人士对民间的这种恐惧感到迷惑不解。报纸上充斥着各种不负责任的奇闻轶事，例如有的报道说，某地有一人愿以他的整个农场作赌，以证明他最好的马队比电报传播消息的速度更快。甚至连曾经科学地思考电报重要性的人，也表现出对新的技术感到心神不安，对这种新技术的核心——

电——没有人能真正地理解它。当时知识界对电报的可行性的赞美是一致的，但对于赞美的理由，他们却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和谐的背后意味着通讯本身的涵意在变化之中。

对电报的认真思考，通常总要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其它科技奇迹，如火车、轮船等。然而，电报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使它看上去更超乎寻常。尽管19世纪的科学已经在一些领域内开始利用电能，但对电是何物仍然无法说清。丹尼尔·戴维斯，波士顿的一位电气学家和机械师，曾为莫尔斯大量制造电报设备。他解释说，在闪电中，在动物毛发里，以及日常生活的其它场合中都可以观察到电的存在。可电同时又是不可见的，是“一种主要的动力——它赋予物质大量的化学和力学特性。”

一位电学史作者写道，尽管电被电报驯服了，但它仍然是“幽灵般的，神秘的和难以理解的。它仍然生活在太空中，并且似乎联系着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现代的电报历史专家们一再对这一奇异现象加以评述。“电的巨大能量潜藏在所有的物质如地球、空气、水等里面，它渗入宇宙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微粒中，运动天地万物于股掌之间。然而，它是不可见的，又是不可捉摸和难以分析的。它的潜能似乎无边无际，“它的辉煌战绩只不过显露了一半，而人们对它非凡能量也是一知半解。”

埃兹拉·S·甘乃特牧师在波士顿布道时说，电既是“突然降临的带翅的死亡使者”，又是“物质创造的根本源泉”，“这个不可见亦不可估量的物质、能量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地明了，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东西——已被我们控制了，象一个忠仆，或者说，更象一个奴隶一样为我们服务”。

在显著增强人类控制环境能力的方面，电和蒸汽机不无相似之处。但相对而言，后者是可见的和有形的，“在火车的震荡和引擎的轰鸣中没有多少诗意和伟大之处。”一位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

说：“电是科学的诗，没有一种传奇和故事能比它更精彩以及创造出更多的奇迹。”这种新的电磁科学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在将被揭示出来的自然力面前，蒸汽机的巨大能量会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约伯记》38：35）这条圣经语录，说的是约伯无法做到的一件事，目的是为了证明他的无知和弱小，它常被19世纪有关电报的书籍加以引用。它充分表达了那些著作想要描写的一种奇迹感。作为电学最激动人心的产物，电报的产生预示着奇迹般的未来。历史学家和早期电报的支持者T·P·谢夫纳在总结以往各种通讯形式的历史时说道：“闪电，这神话中耶和華的声音，无所不在的云中恶魔，终于被人们征服了，在痛苦的束缚中履行信使的职责——到世界各地去悄声低语吧，高贵的人发出了高贵的命令！”

在谢夫纳和其他人从通讯发展这一着眼点把电报看成是改写历史的手段时，有些人正陶醉在电报对未来的贡献中。他们总是喜欢谈论双重奇迹：“瞬间通讯的精神意义和闪电式传播本身的奇妙色彩。”全球通讯成了一句口头禅，电报预示着一个由利益和具有相同思想的人以及基督教全球胜利所构成的实体的到来。“它给那些在人道方面表现最高成就的国家带来了力量上的优势——尽管这些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数量微小，由于先进的通讯手段，它们远胜于野蛮的游牧民族。”世界和平和协调此时看来，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备现实的可能，因为电报“用具有生命力的电线把所有国家联结在一起，当这样一种世界各民族交流思想的工具被创造出来后，古老的偏见和敌意便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正如电报将引起“一场崇尚道义的革命一样，这个工具本身似乎具有永恒的奇迹，这一奇迹不会因为人们对它的熟悉和了解而变得平凡”，“它的特性得之于它所驾驭的自然和它所服务的目标。除了精神上的目的而外，它要达到的目标还能是什么呢？不